

“新规划之‘新’：新命题、新内涵与新实践” 学术笔谈

孙施文 程天烱 曾 鹏 单卓然 黄亚平 张 颖 王伟强 孙 娟 恽 爽 朱丽芳
单 樑 王新哲 牛 强 张 浩 丁 亮 陈 晨

【主编按语】“新规划之‘新’：新命题、新内涵与新实践”

当前城市发展正面临发展方式转型、人口结构转变、技术范式跃迁、气候变化加剧、风险高度不确定等多重挑战，传统规划范式已难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问题与发展需求。为回应这一现实，我在2025年底学科发展论坛上，正式提出了“新规划”（New Planning）这一框架，强调回归规划处理不确定性的本质，推动学科系统革新。这一背景下，本刊2026年组织新一期学术笔谈“新规划之‘新’：新命题、新内涵与新实践”，邀请来自规划研究、设计、教育和实践一线的十五位专家，围绕“新规划”需要回应的时代命题和旨在解决的关键问题、与传统规划在对象、价值、技术方法等方面的不同、“新规划”类型和实践等议题展开讨论。

1. 规划价值与话语重塑

在快速变化和不确定性加剧的时代，规划价值首先需要重新确认。单樑指出，城市化下半场的深刻变化要求规划在变化中重建处理不确定性的能力，引导城市有机生命体持续演化。曾鹏进一步强调，规划不仅要回到价值本质，更需从本土哲学、系统思想和审美经验中重建话语体系，实现规划理念的本土化表达和方法本土化实践。孙娟提醒，在高度复杂的现实中，规划必须兼顾“快变量”与“慢变量”，既快速响应产业、人口和技术变化，又守住城市人本、历史文化和自然底蕴，从而保持规划的社会张力与专业定力。

2. 规划对象与场域拓展

新规划不仅在价值上有所重塑，其对象和场域同样在拓展。王新哲提出，规划对象已从城市扩展到乡村、区域乃至立体复合空间，规划能力也从成果生产延伸到全过程服务和复杂系统管理。恽爽指出，详细规划正从单纯管控工具转向统筹资源、组织高质量发展的综合配置平台。朱丽芳以“超级海岸带”为例，展示了陆海统筹治理的新实践，强调生态、功能与市民体验的复合协调。单卓然、黄亚平提出，都市圈规划应以动态协同为核心，依托数智平台实现跨行政边界的功能整合和联动优化。陈晨则指出，大都市周边乡村的复杂演化要求规划从静态编制转向数智化、规律化的动态调控，以应对城乡关系重构与多功能转型。

3. 动态响应与柔性逻辑

新规划的第三个特征是逻辑的柔性化和动态化。牛强、张浩提出，随着智能体、远程办公、智能配送和低空交通等技术渗透，城市组织逻辑正在流态化，规划必须柔性化，重构功能复合、网络弹性和人机协同体系。丁亮则提醒，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在存量时代必须从统一标准、总量管控转向差异适配和落地赋能，实现规划内容、方法和规范的全方位升级。程天烱与孙施文进一步强调，新规划在复杂城乡条件下应具备包容性与韧性，将规划实施成效置于核心，通过多元主体协作和动态评价机制，实时感知和响应社会、经济与技术变化，实现规划从被动承压向主动演化的转型。

4. 教育、能力与技术的整体革新

“新规划”最终必须回到以人为本，并通过教育、能力与技术更新形成新的专业体系。张颖、王伟强从教育视角指出，规划教育应问题导向、多学科交叉，并融入人工智能与数字技术，同时坚守空间回应社会问题的学科专长。陈晨进一步强调，大都市周边乡村的复杂演化和城乡关系重构要求规划者理解多功能转型与复杂系统，利用数智手段进行规律挖掘和动态调控，实现城乡空间治理的整体适应性与精细化。这说明，“新规划”不仅是理念更新，更是规划能力、教育培养和技术手段的系统革新，使规划学科能够在不确定性条件下实现价值创造和社会回应。

建立更具包容度、韧性和注重规划实施成效的规划范式

孙施文（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程天焱（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博士研究生）

规划作为一项有关城乡发展的公共事务，“新规划”之“新”应当结合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实现由“命令—控制”型规划向适应治理需求的“协商—合作”式规划的转变。而要实现这种转变，除了要建立并完善各行各业各类群体共同参与讨论、协商、协同决策的体制机制，也需要实现规划范式的转变，建立更具包容度、更具韧性和注重规划实施成效规划体系。

（1）在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过程中，全面落实“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人民城市人民建”，就是人民要参与到城市建设和规划的过程之中；“人民城市为人民”，就是人民的意愿要在城市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得到体现。“新规划”应当是人民的规划，而不仅仅是政府的规划，更不能只是部门的规划或者只是规划师的规划。现代社会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复杂性、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多样化，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也是多种多样的，这就要求规划从具体的人群及其需求出发，包容和实现他们的愿望，并协同这些需求的相互关系，不断调适空间资源的配置和协同各种利益关系，增加各类群体在规划过程中的获得感、满意度、幸福感。

（2）在凝聚和强化刚性要素、底线要求的基础上，完善分层分级分类的职能分工，提升规划适应变化的程度。全球气候变化、技术革命加速迭代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全球产业链重构、人口和社会结构变迁以及公共安全等所引发的未来发展不确定性以及各类社会经济技术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复杂性，要求规划具有适应性韧性的能力。一方面，对于生态安全、粮食安全、文化传承等底线要素进行刚性管控，但底线的内容及其空间范围应当是有限的，否则就谈不上是底线。另一方面，要扩大适应变化需求的可调节范围，建立明确的分层分级分类的职能分工，在加强制度建设的基础上，将适应变化的管理权、决策权尽可能地由实务操作的层面下放，使规划具有更强的、实时的应对能力。

（3）建立分层级、可测度、实时有效的规划评价体系，加强问题导向、过程管理为核心的规划制度建设。对应于各层级规划管控的内容和职责，建立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生态效应评价体系，作为规划制定和规划实施过程中各项决策的依据。只有具有较为明确并为社会所认同的评价准则，才能更好地协同多元主体的行动意愿和行动步骤，从而达成协商和合作的目标。要把规划的重心从管理规划编制及其成果转移到管理规划实施过程上，城乡发展中的问题出现往往具有特定场景的具体性和随机性特征，因此，要及时面对出现的问题，作出规划响应，就要求规划体系能够持续感知环境变化，建立制度化的学习与反馈模型，通过采取具体行动以及在行动过程中开展协商，统筹协调各方诉求及其利益关系，在规划目标引领下作出规划决策。也就是要在应对变化冲击的过程中不断优化自身结构，

实现从被动承压到主动演化的转型。

（4）提升规划协同和利益调配能力，有效发挥综合协调作用。规划以空间治理作为己任，但要真正走向治理型规划，就需要充分认知空间资源及空间关系所承载的社会经济内涵及其关系，既要发挥实现国家战略的空间资源配置作用，又要在协商和合作过程中发挥统筹协调的作用。因此，“新规划”就需要组合财政、税务等利益调配手段，运用“控制+调剂”“诉求+反应”等方式方法，在空间要素配置、空间功能和形态组织等原理和思维方法的基础上，掌握和运用解决空间矛盾、调适空间关系的底层逻辑和操作手段，在实时场景中协调、整合各方利益关系，保证规划目标的实现。

总之，“新规划”必须面对城乡未来发展中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锻造规划体系本身的“韧性”。这种韧性并不只在于土地使用的兼容或混合使用等，也不只在于各类工程设施抗击灾害及灾后恢复的能力，而在于整个规划体系能够包容一些未被预见到的变化需求，能够及时适应变化了的场景，能够及时修补和完善既有规划来回因变化而产生的振荡效应，维持规划的持续运行和作用发挥。这就要求“新规划”要从静态管控转向动态感知，这种感知既包括了物质性的，更应包括社会性的；对于同样的变化，不同的人群、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人群有不同的诉求、愿望，单一的反应肯定是虚假的。有效的治理要求规划具有及时发现变化需求、快速作出响应变化的规划策略、及时修补和完善规划内容的能力，这是现有建立在“命令—控制”型规划基础上的规划体系所不具备的。

积基树本，日新又新：“新规划”的内涵延拓与范式创新

曾鹏（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教授）

面对当代中国城市发展的新问题与新挑战，西方规划理论越来越难以实现本土化转译，传统规划范式的应解能力亦无法满足日益复杂的多元需求，规划的价值与作为面临时代考验。对于科学研究以及行业实践而言，规划理论、规划方法和规划工具的更新已是在弦之箭。

“新规划”（New Planning）框架下的学科系统革新与范式迭代是规划教育和行业焕活的基础，也是中国本土规划理论内涵延拓与话语体系建构的必由之路。以下从规划价值、规划范式和规划技术三个角度谈一点对“新规划”的认识。

一、根植本土实现“新规划”话语体系重塑

快速城镇化时期，西方理论的本土化转译曾是指导我们工作的重要武器；随着中国城市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现有体系难以满足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需求；探索规划学科的本土理论、重塑中国规划话语体系的需求愈加强烈。

话语体系作为思想表达和价值传递的系统性工具，其内涵远超单纯的形式与技巧层面，是长期实践中形成的认知框架与表达范式。面对新时期我国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总体目标，根植本土的哲学观念、系统思想和审美情趣，建构与中国城市发展相融相洽的话语体系至关重要。我国自古以来崇尚“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哲学观和美学观，“赞天地之化育”“万物

一体同仁”表达了古人对世界的系统认知；天地万物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维持均衡需要不断“调和”与“顺应”；“系统思想”和“动态思想”成为中国哲学的底层逻辑。同样，传统哲学认为“人为万物之灵”，以人为本是治国理政的关键，“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人与自然两情相洽的审美观照，天地人城和谐共生的价值理念也被融入传统营城智慧当中。由此可见，“系统观”“动态观”“人本观”是本土哲学的根系，也是现代化人民城市规划建设的重要思想基础，更是“新规划”亟须重塑的价值理念。

二、智慧共生支撑动态推演的“新规划”范式

传统规划范式的目标是完成特定时空范围内的美好蓝图，并将其作为组织规划实施行动的依据，其背后逻辑是对确定性结果的依赖，以及对过程动态性的排斥，在实践中往往表现为路径偏好与目标偏差，影响了规划落地实施的成效。传统范式的“政府—规划师—公众”三元关系中，公众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其多样化需求被专家进行经验式转译，形成规划方案后经由政府决策而传导实施，其中公众参与环节的效能常常属于底线关怀而不具有建设性。

“新规划”范式需要明确人本复归的价值观念，基于智慧基础设施与人工智能技术，迭代建构人与城市“智慧共生”的规划理论、方法和工具体系。通过智慧感知、数字孪生、机器学习、情景模拟等新兴技术，建立物质空间、数字孪生、社会空间融合共生的智慧化城市环境：人的真实需求能被及时采集并科学评估、反馈，智慧化的城市服务和城市产品以人的需求为目标多样化供给并更新；人与城市通过多维数字孪生的中介平台形成“互馈—共学—共生”的双向响应机制，城市规划从“静态蓝图”转变为“动态推演”的智慧化工具；城市系统的复杂性和规划过程不确定性被充分接纳和创新响应，以人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在智慧平台上实现升级。

三、未来场景驱动多元融合的“新规划”技术

城市规划是具有强烈实践导向的交叉学科，兼容并蓄是其与生俱来的基因。自诞生伊始，城市规划便以开放包容的架构吸收多学科的知识 and 理论，以融合的技术应对城市中的复杂问题。回溯历史，能源供给的迭代、交通方式的变革、城市风险的防控都曾引起城市空间使用的革新，进而诱发规划技术的演进。

当下，城市空间、城市服务、城市产品的创新和迭代速度远超以往，崭新的空间使用场景层出不穷：新能源汽车重塑城市交通环境，充电桩布局诱导出行模式和公共空间变革；能源基础设施从城市“后台”走向“前台”，光伏城市、零碳社区给出现代城市的新形态；低空空域的逐步开放给城市交通模式和人居模式带来潜在的革命性改变，描绘出全新的立体空间图景；蓝色能源与蓝色经济的兴起为滨海城市注入转型新动能，陆海统筹从战略导向走向价值实现；复杂风险、链式风险不断侵扰现代城市，系统韧性提升已超越工程韧性成为重要的规划技术。未来已来，这些场景并非遥远的空间畅想，而是正在发生的规划实践，它们共同指向一个基本判断：城市空间正在经历迭代

式演化，“新规划”亟须做出前瞻性响应，融合相关领域的新方法、新技术，以场景为驱动实现规划技术的系统创新。

“积基树本、日新又新”，面向新时期新需求，“新规划”是一次根植本土、面向未来的范式跃迁。本土之根充分汲取营养，创新之翼才能自由翱翔。

践行新规划：都市圈国土空间规划的技术响应与优化探索

单卓然（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教授），黄亚平（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在当前城市发展转型、科技革命兴起与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复杂背景下，吴志强院士提出的“新规划”框架强调回归规划处理不确定性的本质，推动从静态方案绘制向动态、适应、综合协同的过程设计转变。这一转向在都市圈国土空间规划中尤为迫切。

新时期都市圈是国家参与全球竞争、促进国内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空间单元，肩负着打造内循环节点、推动深度同城化的重要使命，其发展面临三方面现实考验：其一，2019年以来近20个国家级都市圈虽普遍编制了发展规划，但开展国土空间规划的实践较少（仅上海、武汉、长株潭、成都及最新的首都都市圈等），相关理论方法尚显薄弱。其二，我国城市区域尺度大、空间结构嵌套，具有高密度人口分布与紧约束用地特征，多数都市圈将形成“强核轴带圈层式”空间结构，该尺度下的协同发展和规划技术仍不成熟。其三，数字化技术在都市圈规划编制、监测与动态优化中应用尚浅，关键技术及数智设施亟待加强。

基于本团队近年参编《武汉都市圈发展规划》《武汉都市圈国土空间规划》《武汉都市圈空间优化技术研究及应用平台》的实践，以下从三方面探讨“新规划”指引下的都市圈国土空间规划创新。

1. 进一步创新都市圈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技术方法

区别于国空改革前的区域性空间规划（如城镇体系规划、主体功能区规划、区域规划等），应构建“空间治理目标—空间发展格局—空间要素管控”的都市圈国土空间规划技术框架，以生态安全底板、一体化空间模式、三类空间优化、要素设施链接等为目标引领，以适配生产力布局与区域均衡为导向塑造空间格局，围绕底线统筹、格局建构、分区协同、要素链接、行动协调等维度提出空间协同规划技术要点。应遵循“强核轴带圈层式”空间模式，建构都市圈整体空间优化格局，明确协同重点领域，包括共保绿色生态及韧性安全空间底板、共筑一体化空间发展格局、分区域分层级差异化空间协同、注重分领域分要素空间链接、推进有条件地区率先同城化发展等，并制定“弥合式”策略，聚焦关键要素区域格局与功能网络组织、“圈层+廊道+临界区”结构支点空间布局、统一市场与收益分配机制等政策清单，形成“全域多尺度—全要素多类型”的跨市域协同管控新范式。

2. 加强都市圈国土空间数字化基础设施（平台）建设

将超大城市数字化规划技术拓展至都市圈尺度，需搭建覆

盖“智能诊断—模拟推演—优化决策”全流程的数智化平台。平台应具备至少三项核心功能：一是都市圈全域多源数据融合与国土空间运行状态感知诊断功能，融合物理空间、动态关联、第三方评价、经济社会统计等数据，建立统一标准的都市圈“生态—生产—生活”空间数据库，开发韧性风险、功能协同、产创融合等感知模块，建立产业链分工指数、协同创新能力、城际联系强度等感知评价指标及因子计算公式；二是都市圈“三生”空间多情景模拟与预警功能，基于常态发展、重大政策驱动、极端状态等情景，预测用地扩张与水域损失、降水与洪涝风险、通风潜力与风廊路径，模拟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网络扰动及生产空间变化，推演人口及用地总量约束下的城际要素流联系、区域性重大服务设施需求概率等；三是都市圈国土空间“格局—要素”协同管控与智能优化功能，结合“十五五”重大项目与约束条件（如碳排放、用地规模），生成方案并支持指标比选，辅助都市圈重大工程选址与布局调整，弥补“一张图”系统在区域尺度应用的不足。

3. 深化都市圈内重点区域与跨区域联结型地区的规划研究

一要加强城际交界地带研究，厘清都市圈临界合作区（或类似地区）地域范围测度、动力因素识别、潜力功能预测的方法与空间协同模式，提炼上海、北京、南京、武汉等多地相关规划的共性技术框架、内容与标准；二要拓展都市圈产业及科创协同走廊研究，总结以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实验室、大装置、新型研发机构等）、新兴与未来产业为纽带的跨市域一体化走廊的空间效应与机制，推广G60科创走廊等实践的成功经验；三要推动主体功能区在都市圈尺度的精细化与政策升级，构建“板块—组团”功能分区体系，对都市圈次级区域进行规划指引并制定差异化管控规则；四要前瞻探索都市圈城乡融合单元、韧性生态绿心、专业功能小镇等新兴空间类型的规划方法。

有鉴于此，构建超越行政边界的功能性地域，发展以都市圈为代表的城镇化空间形态，是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与区域资源配置的必然选择。面对都市圈在发展动力、协同进程等方面的不确定性，应坚持空间规划内核逻辑，融汇多学科理论与方法，持续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都市圈“新规划”之路。

新时期城市设计教育转型

张颖（上海尚方规划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总工程师），王伟强（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转向提质增效的新阶段。在此背景下，吴志强院士提出了“新规划”的理念，如何回应这个“新”，既是应对城乡规划的转型，又是应对规划教育变革的期许。常言道“温故知新”，回顾我们过去在城市设计教学研究中，对西方城市设计教育历程演变的分析以及对国内城市设计学界知名学者的访谈所积累的研究经验，再展望未来，可为对城市设计教育如何向“新”提供某种启发性思考。

1. 自20世纪50年代美国率先提出城市设计复兴以后，欧美大学的城市设计教育议题一直与社会进程密切联系，包括大都市的再中心化、新城市主义精明增长、步行城市和公共空间改

造、老工业区复兴、战后大型住区改造、历史地区修复、景观弥合等领域。城市设计教育也表现为：学术前沿和实践场景相结合的开放式教学、专门人才和通用能力培养并举、以空间为内核拥抱新技术等特征。

虽然各国城市设计教育有其各自特点和国情基础，但其社会需求与城市设计教育之间的正相关性特征，对于我们有积极的启示意义。其一，在城镇化的成熟阶段，社会对人居环境品质提出了更高要求；其二，开发模式转向小规模、渐进式、更新化、综合化解决社会问题；其三，空间治理模式更加民主化、精细化和以人为本导向。这都预示着城市设计教育和学科不仅不会萎缩，还需提质发展，完善教育体系、筑牢学术基础、形成“学—研—用”闭环、凸显人才培养及学科价值。

2. 在2022—2023年两年中，我们曾就城市设计教育议题访谈了国内16位知名专家学者。

“社会需求和价值”是专家们谈论最多的内容，强调城市设计不仅在塑造城市风貌、提升环境品质方面发挥核心作用，也要看到其在精细化管理、城市更新、新型城市等领域有广阔社会需求。

“学科知识发展”排在第二位，强调多学科交叉融合的重要性，既要结合社会学方法关注社会问题，又要懂得财务和资本运行逻辑、项目运营方法、生态环境规律等与城市运营相关的内容、强化学科知识内核，更要积极学习新技术、大数据应用以及人工智能的探索。

“专业培养、设计能力”虽然是核心，但新形势下需要拓展“设计+”、“城市+”的能力，运用“一张蓝图”和“城市思维”解决系统性问题。

“教育体系发展”也被反复强调，完善课程体系、完善本科生与研究生城市设计教学的梯度化关系，提高课程的相关性与有效性，还要注意近些年部分教师实践能力下降、部分教学脱离实践的新问题。

3. 温故知新，更要推陈出新。前述议题的思考，我们应该认识到新规划既需要新思想，也需要坚守专长。城市设计教育改革亦应“打好基础、深化学科、驱动创新”，方能行稳致远。

（1）坚持问题导向，与实践相结合

面向社会是规划教育的优良传统，城市设计始终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以空间响应为手段”的教学要求，引导学生在城市设计课程中灵活运用所学的理论方法，抓取城市热点问题开展城市设计研究。教学选题应与设计实践紧密结合，聘请一线规划师、建筑师参与教学。积极与国内外高校广泛合作，开展多样的国际合作教学模式，增进国际化视野。这些经验应该坚持。

（2）深化多学科交叉，培养复合人才

多学科交叉是城乡规划和城市设计的基本逻辑。新时期城市设计实践将面临更多层级的价值追求，复杂的约束条件、多元的利益平衡、更高的营造需求，必然要求未来的城市设计人才既要有设计能力，又要有城市思维，既要具备复杂问题定义、资源整合活化，又要具备跨学科协同、创新性解决问题的综合

能力；要推倒规划“八股文”风气，改变学生离开PPT不会讲话的弊习；应学习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依托规划系建立跨学科教学组织平台，柏林工业大学打通建筑、规划、景观、社会和环境等五系的藩篱联合指导，代尔夫特理工大学融入多学科研究方法，开展跨领域设计训练等，将跨学科首先落实到教学体系中；还应建立就业需求导向的交叉培养方向。

（3）拥抱新技术，推进学科创新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传统学科的工作如何借助新技术创新，是学科生命力发展的关键。大数据、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技术正深刻改变着城乡空间认知和治理方式。数智赋能不仅是技术工具的升级，更是教育范式、知识生产、行业竞争力的整体重塑。未来的城市设计教育可推进两方面工作：一是建设深度融合数智技术的高阶课程和培养项目，培养统筹“数字—场所”空间的复合型规划师；二是适应“知识生产模式3”的创新生态模式，整合数据、平台、场景与反馈，借助数字技术在解决复杂问题中推动教育、研究与实践协同演进，改进城市设计的经验学科特点。

新规划：在“快”与“慢”之间

孙娟（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

编辑部发来邀约时，我正收拾2025年第200天的出差行李。回望2年前写下的《立志欲坚不欲锐》，字句依旧滚烫，彼时的那份乐观如今读来有点佩服自己。行业比想象中温差大：项目迭代频率翻倍、难度指数翻倍、出差天数翻倍，职业群体倦怠与迷茫也随之悄然攀升。2024年的“坚”，是乐观地相信明天会更好；2026年的“坚”，是清醒地承认转型很艰难，但依然选择在快变量中守住慢变量的底线，在慢变量中校准快变量的偏差。毕竟，城市对规划有新需求，城市需要好规划。

城市新需求。在城市一线场地中我们看见城市有太多的新命题需要规划师去研究、去答题：产业迭代之快，要求城市空间能跟上更新步伐又要避免盲目调整带来空心化问题；人口流动和人群结构变化之快，要求城市一边补足设施短板老问题，一边回答某些设施因人口结构变化而空置的新问题；国家城市更新资金投入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历史文化街区等等特定区域后如何实现地上地下、面子里子统筹联动，让有限的资金撬动更大的城市综合效益；AI技术进步之快，使得生产生活方式也在改变，产业区里需要有创新，办公楼里可能要生产，生活区就业区，co-living、co-working、opc社区新概念空间在现实发生着，传统的空间管制、设计定制、管理治理方式如何跟上人工智能时代的步伐，也是快变量给城市规划师提出的新需求。

规划新方法。城市新需求带来的是传统规划技术方法的不适应，以产业快变量为例，很多观点认为城市产业是无法预测和规划的不确定变量，我们在太多的园区看到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合理规划双向奔赴产生的积极效果，政府营造好的产业生态圈、有序的产业空间供应、懂专业懂服务的管理者对城市产业发展发挥了强劲的催化剂作用，反之亦然。好的规划能嫁接

起产业端需求和政府端供给，让企业需求被看见，让政府招商有章法，让产业空间供给更理性。这就要求规划师懂产业、懂企业、懂空间：一方面可以围绕产业链分析、企业图谱构建等大数据资源，实时监测企业动态与行业变迁，精准识别关键企业与特色赛道；另一方面能在现场深度了解企业运营、产业特征甚至是企业家生态圈，将数据和在场产业生态结合起来，为产业平台精准招商、精准服务企业与空间供给提供科学规划。

同理，针对人口快变量，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提出，空间精神和社会属性的关键在于城市人，特别是本地人能真正被规划看见，场地里人群画像是什么特征，人群行为有什么特点，人群需求是什么，成为每个存量规划不可回避的话题。好的规划能真正贴合人的行为轨迹，实现空间与人群的精准适配，让快反应真正服务于人的真实生活。针对货物流变量，全球供应链格局的变迁让货的流动再次成为城市关注的焦点，规划需要对货物结构、运输成本、贸易政策、出海方式等原来并不熟悉的领域创新深挖和阅读理解，方能给出适应未来供应链逻辑的城市货、产、人联动方案。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大量领域需要去学习、去探索、去创新，这是一份在向城市学习过程中长本事的职业。

规划师新技能。当如此多相对不确定的“快变量”需要去研究和适应的同时，我们往往发现决定规划好不好的关键是很多确定的“慢变量”。敬畏自然山水、人文精神、历史底蕴就是规划的确性和可持续性，聚焦“城市人”让规划真正成为连接人与自然、人与城市、人与人的纽带。

所以在地性和情感链接成为规划师的基本技能，过去的2年我接触了很多不一样的青年规划师：有懂运营的街道更新操盘手，在武夷山开办了武夷雅集，成就了一条步行街的建成，为地方带去了不仅是物理空间的改变更是运营思维方式的变化；有超级耐心的关系协调者，在上海的南京西路街道南西院子里，用2万元的更新基金为20多户居民带来邻里社区关系的变化；有翻井盖的污水治理工程师，90后阳光小伙在上饶驻场200多天后，让县城出租车师傅都能记住，这是实实在在为我们城市水环境改善付出真心和坚持的团队。看见他们的行为，真的不得不感叹规划师群体就是将各个专业融会贯通搭建城市更新生态圈的超级个体。

2026年的“坚”，早已不是不问世事的一腔孤勇，而是直面现实的清醒与笃定：我们既需要算得快，又需要走得慢；既要拥抱技术革新，又要守护人性温度；既要追求专业卓越，又要允许渐进适应。规划师的天赋乐观主义，从来不是相信未来一帆风顺，而是相信即便衣带渐宽、步履维艰，我们依然能在快与慢的平衡之间，为城市守住那份值得的真心。

新时期详细规划的综合性价值思考

恽典（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院长）

在近年的国土空间规划改革中，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编制成果和技术思路变化更多体现了“多规合一”背景下“自上而下”的制度性变革要求，虽然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编制成果形式

变化不是很大,但面临的变革压力和现实挑战仍然非常突出。这种压力和挑战来自社会对空间价值认知的转变,来自经济增长方式、治理方式变化对空间资源利用方式的倒逼。在城镇规模快速扩张时期,传统控制性详细规划与房地产发展模式紧密挂钩,当下房地产增量时代面临结束,“土地财政”难以为继之时,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的价值如何体现?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了建设创新、宜居、美丽、文明、韧性、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目标,这一目标如何在城市建设中找到具体的建设模式和路径?城市发展的顶层设计需要空间的配合与支撑,因此空间作为一种核心的发展要素开始被深度纳入城市发展体系,详细规划当下已经成为城市政府的空间综合配置工具,而不是单纯作为自然资源管理部门的管控工具。

面临社会经济新发展形势的要求,详细规划作为空间配置的政策性工具,必须以需求和问题为出发点,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以权益协调为基础,以土地用途管制措施和政策工具为手段,依托新型智慧规划工具统筹产业、生态、社会各种要素的空间布局,通过优化空间资源资产配置提高社会总体运行效率。

一、详细规划体现自身价值的几个新视角

1. 谋划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底座

地方政府谋划的城市发展新目标、新模式在实施落地过程中,需要以空间为支撑,将发展目标拆分成各层级治理主体和各部门的任务包、项目单、路线图、时序表。在这一过程中,详细规划需要充分发挥规划的引领作用,应对空间资源的高效配置要求,综合运用问题诊断、需求分析、权益协调等分析工具方法,深度融合智慧、生态等高质量发展理念,通过跨专业技术的技术统筹协调,形成各层级、各类型空间资源配置的新标准、新模式、新路径,提供新发展理念系统性空间落地的技术答案。

2. 贯穿高质量实施全过程的综合集成平台

在规划编制和实施过程中,融合项目策划、土地供应、投资估算和运营需求等全过程实施环节要求,协调产业、交通、文旅、公共服务等多部门和实施主体的技术标准,针对各种细分场景制定精细化空间配置和建造方案,充分响应新业态需求,营造特色化场景,保障规划的高效实施和空间资源资产的保值增值。

3. 服务城市治理的系统谋划和综合统筹

政府在城市建设各项决策中面临着越来越复杂的多元需求和政策环境,这种需求有很强的针对性、时效性和灵活性,应在长期的技术服务中不断积累城市治理问题和对政策的综合集成研究,充分研究空间资源配置与当下市场需求之间的“断点”,研究如何通过空间营造和政策创新松绑和激活市场需求,同时规划也需要协助城市跳出“缺什么就补什么”的简单逻辑,以城市发展的系统性视角,通过更大范围、更加综合的更新资源和任务统筹和政策工具引导,建立城市建设与更宏观的发展目标的有效连接。

二、新时期详细规划技术工作提升建议

加强对政府综合性发展目标的政策解读、技术转译和分解输出能力,扩展政府决策咨询、政策咨询范围。加强规划体检、策划、编制、实施全链条的工作协同,重点服务地方政府的“多规合一”综合行动计划实施,主动谋划实施任务和建设项目,建立空间规划对分专项任务的技术协同接口,形成“综合性城乡建设行动纲领+配套空间方案+专项领域实施策略”特色规划服务模式,从规划设计服务向地方发展综合谋划支撑升级。

以空间资源配置优化为核心,重点研究规划用地布局与各项系统关键指标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研究各类土地用途管控工具与专业部门管理之间的协作关系,研究与多实施主体协同实施的技术协作关系。融合城市设计工具,研究提炼各类特色场景营造中关键要素组合配置的新模式和新技术,提升面向特定人群和特定功能需求的各类新场景的搭建和落地能力。加强跨行业数据获取、整合并与空间绩效挂钩的综合分析,为地方政府提供跨部门的综合性评估和建议。

超级海岸带:上海超大城市陆海空间治理的创新探索

朱丽芳(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党委书记)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海洋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空间资源。上海以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为目标,在推进海洋强国战略中肩负重大使命。应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不断深化的规划管理改革、逐步凸显的超大城市客观发展需求,上海积极探索陆海统筹、资源整合、空间优化的路径方法。

1. 海岸带对于上海城市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价值意义

上海位于“一带一路”共建和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交汇点,是长江经济带走向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作为世界级的河口海洋城市,其海岸带意义价值重大。

涵养了丰富的生态资源。上海是滩涂湿地上生长起来的城市,滨海湿地滋养着全市70%—80%的野生动植物物种,崇明东滩、九段沙、南汇东滩位于全球8条候鸟迁徙路线“东亚—澳大利西亚迁徙通道”的中段,每年有上百万只次候鸟过境。同时,丰富的湿地空间为上海抵御自然灾害构筑了韧性防护的关键屏障。

培育了硬核的生产要素。上海大陆岸线海岸带长218 km,沿海岸线向陆一侧纵深5 km范围内汇集国际机场、港区、邮轮、极地科考,以及钢铁、石化、海工船舶等“大国重器”产业,是海洋经济发展、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产城功能融合的战略发展要地和核心承载空间。

塑造了独特的生活空间。上海大陆海岸带陆域范围内覆盖了1个新城、26个街镇,约180个行政村,1600个自然村落,近300万人口。在世界第三大河长江和我国潮差最大海湾杭州湾作用下,水沙交换、咸淡交汇的自然地理,孕育了熬波煮盐、筑堤赶海的独特生活空间和习俗,展现了沧海桑田的海洋文化特质。

2. 超级海岸带:上海陆海空间治理的新模式和新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新路。海岸带作为上海推进自然共栖、人海和谐、韧性发展的重要载体，持续创新空间治理思路、模式和路径。

提升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探索韧性共生新模式。上海作为滨江沿海的超大城市，既要应对风暴潮等气候变化风险，又面临长江流域输沙减少、长江下游堤岸安全等多重挑战。近年来极端天气事件频发，上海海岸带地区出现了部分海塘前滩地冲刷、堤后低洼地积水等风险，对海岸防御系统提出了更高要求。借鉴国际上诸多沿海地区经验，不单纯依靠提高防汛墙高度，而是通过柔性自然的生态设计，提升岸堤及周边地区系统韧性，提高整体防汛能力，探索“与水共生”可持续模式，打造更生态、更安全的韧性海岸。

回应市民高品质生活需求，塑造滨海城市新亮点。上海海岸带认知度不高、岸线可达性弱、滨海景观体验差，缺少与上海现代海洋城市定位相匹配的高品质空间和活动。纵观国际知名滨海地区，滨海空间是城市重要的IP，如加州1号公路蜿蜒1000 km串联标志性滨海景观节点，欧洲瓦登海国家公园依托潮间带资源打造“泥质海滩”特色徒步线路。上海将系统梳理滨海空间资源，增加更多体现海洋文化和城市精神的高品质游憩空间，激活滨海镇村功能，回应市民亲海的美好需求，让海岸带成为全民共享的城市新去处。

践行全域全要素治理要求，探索统筹利用新模式。上海海岸带地区集聚了“滩水林田湖草湿土”等要素，新成陆空间、战略预留区、重大产业等空间资源较为丰沛。围绕陆海统筹“一张蓝图”，需进一步转变陆海二元的治理思维，持续优化陆海统筹治理机制，强化江海联动、河海互通、陆海协同的保护与利用格局，实现全要素统筹保障与资源节约集约利用，为战略性资源有效有序配置提供更有力的保障。

3. 上海超级海岸带规划的思路和展望

面向未来，上海正以“V形海岸带”项目为抓手，探索超大城市海岸带空间治理的理念、模式、功能、机制。

理念重构，从城市轮廓到超级岸带。上海的海岸带在历史上均为城市向海发展的边界轮廓，见证了上海人民治水管城的智慧。未来海岸带地区以“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超级生态堤、最美海岸带、市民好去处、都市后花园”为目标，进一步创新海岸带空间利用新模式，强化资源整合、功能聚合、蓝绿融合和空间复合，着力统筹生态、生产、生活功能，构筑集防灾减灾、生态保护、休闲游憩为一体的“超级海岸带”。

规划引领，从疏离断点到协同联动。强化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构建陆海一体空间格局。纵向贯通，打造“超级生态堤”主脉，通过水陆多线串联激活临港新城、180个镇村组团、9大郊野生态空间和若干重要功能节点。竖向统筹，采用地形塑造、土方综合、一地多能、立体集成的方式，塑造兼具生态景观和安全韧性的生态宽堤。横向协同，强化市域8条垂海蓝绿走廊，构建联通黄浦江、苏州河的公共生态游憩空间，让市民能够更便捷、更愉悦地“看海、亲海、乐海”。

功能重塑，从单一功能到缤纷走廊。借鉴国际滨海城市海岸空间治理经验，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推动海岸带堤防工程生态修复。运用生态宽堤、活性海岸等做法，推动堤岸空间向“韧性共生”转型。统筹海堤沿线各类功能，融入运动休闲、科普教育、观景游憩等多元功能，布局观海驿站、商业文化等空间，实现单一水利工程与公共服务多元功能紧密衔接，提升公众亲海体验，推动海岸带成为缤纷活力空间。

机制创新，从条线独立到一体化综合治理。统筹多元事权，探索构建“全域统筹+单元管控”的协商治理平台。以规划“一张蓝图”为引领，加强海岸带全域资源统筹。创新超级生态堤建设管理机制，统筹协调海洋、自然资源、绿化市容、生态环保等部门管理需求，健全相关领域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探索详细规划层面的单元管控模式，促进海岸带分段管理、分项审批、分层利用。

识变·应变·求变：在变化与进化中重塑新规划的价值 单棵（深圳市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2025年7月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城市化已全面进入以存量内涵式提质增效为主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这一阶段的根本特征，不只是建设任务的变化，更是城市运行逻辑、问题性质与治理目标的系统性转变，变化不再是偶发变量，而成为城市运行的常态背景，规划亟须回归其处理不确定性的本质能力，准确识变，积极应变，主动求变，在变化中引导城市进化。

一、识变

下半场城市发展，变化不再体现为单一要素的调整，而是问题性质的整体跃迁。人口结构变化、技术范式更迭、要素红利减弱、气候与安全风险叠加，使城市呈现出更强的非线性与敏感性。同时，城市价值重心由“承载增长”转向“成就人、滋养人”，城市被重新理解为承载人的发展、生活质量与创造力的有机生命体。

由此，规划面对的已不只是增量空间的配置与管控，而是存量空间的结构重组、历史问题的系统修复，以及多目标之间的动态平衡。“识变”的关键，在于承认城市始终处于进化之中，规划的理论、思想与工具体系必须与城市同步进化。

二、应变

深圳作为高质量速生城市的代表，其发展历程本身就是一部在不确定性中不断修正判断、调整路径的实践史。这种“与城俱进”的特征在深圳生态规划的演进中得到了清晰呈现。

其演进路径并非工程叠加，而是对“城市—山海自然”关系的理解与对待方式不断进化：从以生态控制线“守住底线”，到以绿道网络提供公共可达与共享价值，再到系统推进山海连城计划，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城市形态。

山海连城以“一脊一带二十廊”为骨架、以“千园万径”为脉络，重塑山、海、城相融的整体格局，构建起“连生态、连生活、连生趣”的生态—魅力—活力网络，使山海资源从“望山难登山、临海不亲海”转为“高频可达、可感可用”的公

共价值载体,其本质是将自然从被保护、被隔离的对象转化为城市生命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价值来源。

前不久,获央视重点报道的深圳玉龙垃圾填埋场生态转型项目,正是在这一认知背景下的典型实践。作为快速城市化上半场的产物,集中填埋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以“空间换时间”保障了城市运行,但也长期封存了风险与污染。随着发展阶段变化与治理能力提升,深圳对其实施全量开挖与系统修复,并在“山体公共可用”价值认知框架下,将修复后的山体重新纳入城市公共生态体系,赋能面向未来的数创智谷建设,实现从“城市负资产”向新发展动能载体的转化。

在这一过程中,规划并非简单处置问题,而是通过重塑人与自然的关系结构,引导城市在变化中实现价值再生。以人为本、以自然为友成为贯穿应变实践的不变内核。

三、求变

然而,仅有应变经验仍不足以应对下半场的高度不确定性。城市已进入新阶段,但规划的思想、理论与技术工具体系仍主要形成于上半场增量建设时期,难以全面回应存量内涵发展、价值重塑与新动能培育的需求。

因此,规划必须主动求变,对城市认知体系、理论体系、政策标准与技术工具进行系统革新。深圳正在推进的深圳城市指数(Urban Index of Shenzhen, UIS),正是面向这一目标的探索。UIS并非城市排名工具,而是一套服务于不确定环境下城市治理的行动导航系统,通过构建包含“六分仪、指南针、仪表盘”的导航三件套,帮助城市“定方位、找方向、施方略”,识别不同阶段的协同态,并将深圳实践升华为可交流、可借鉴的城市治理知识体系,为全球城市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城市化下半场,新规划并非对既有体系的全面翻篇,而是在变化与进化中实现系统升级。深圳的实践表明,城市作为有机生命体,其变化是进化的外在表现,而规划的使命在于理解变化、顺应规律、引导进化。正如《种树郭橐驼传》所言:“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这正是下半场新规划的应有之义。

职能—技能—才能:新规划实践的认知与内涵升维

王新哲(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常务副院长)

城乡规划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也是一个创新频出的领域。特别是在考量深度嵌入中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城镇化进程之后,城乡规划逐步演变为参与国家空间治理与公共决策的重要专业力量已是明显的事实。面对复杂的新形势,新规划实践不断涌现。从整体上看,这些新实践并非零散的技术创新,而是集中体现为规划对象、过程、思想体系的结构变化。从“职能—技能—才能”三个层次加以审视,可以较为清晰地揭示新规划实践的演进路径及其内涵升维逻辑。

一、基于“职能”的对象扩张:治理场域的系统性拓展

城乡规划的対象随着规划职能而变化,从都市到乡村、从城市到区域、从陆地到海洋……从学者的探索实验到新空间规划体系的确立,规划“被动”承接了山水林田湖草沙的全域管控职能。这种职能扩张意味着规划被制度性地置于国家空间治

理的关键节点,其责任重心从局部优化转向全域系统管控。规划由此登上了一个广阔的展示舞台,更是一种复杂、全面的治理场域。

规划从业者要研究规划对象的特质,将空间视为一个复杂、动态的“生命体”,理解其生长、代谢、适应和演变的规律。要破除城乡二元与行政割裂,将全域国土视为一个功能互补、命运与共的有机整体。在区域尺度统筹安全与发展,优化资源配置,主动构建与之匹配的新知识、新工具与新标准。从二维平面拓展到三维立体空间,统筹地表、地上、地下。甚至数字虚拟空间,实现立体协同。

二、基于“技能”的服务延伸:实践范式的全过程重构

面对高度不确定的外部环境和多元主体博弈,仅依靠以成果交付为导向的传统规划编制技能,已难以有效支撑规划目标的实现。由此,规划实践逐步突破“方案—图纸—文本”的技术边界,向实施引导、过程协调与动态调整等环节延伸。这种变化不是“做得更多”,而是“想得更深、做得更准”,是一种工作范式的转变,更是一种职业技能的提升。

空间始终是规划从业者的主要服务对象,新时代背景下要从避免外部负效应升维为价值的激发;分析其在区域网络中的独特潜力,可能承载的新功能;通过混合功能、提升品质、链接资源,让空间产生“1+1>2”的化学反应;要“以人民为中心”,利用数字工具和深入的社区访谈,精准理解不同人群(尤其是老人、儿童、青年等)真实、动态的行为模式与需求。规划需要从设计“空间”转向营造“场所”,通过成功的空间运营,实现空间价值的彰显与提升。

三、基于“才能”的智慧彰显:学科思想的方法论价值

越来越多的规划师从事非规划专业,规划设计院也开始承接非规划管理和城乡建设部门的研究任务。服务对象的拓展并非脱离“专业”,恰恰相反,是因其对于不确定性、对于复杂系统、对于多主体的把控智慧。当其被抽象为战略判断、系统整合与协同治理的通用方法时,规划的学科思想便超越了具体的空间载体,成为支撑公共政策制定与复杂治理行动的重要思维方法。

规划从业者要认识到学科的元方法论价值:“在不确定性中锚定方向,在复杂性中建立秩序,在多元性中构建共识。”全面对应了时间维度、系统维度和主体维度,本质上是一套应对复杂系统挑战的高阶元方法论。当然,这种升维并不意味着规划脱离其空间实践根基,而恰恰是源于对空间复杂性长期、系统的应对经验。

四、新规划实践的内涵升维:从适应到塑造的转变

新规划的实践,完成规划新内涵的系统性升维。“职能”扩张是基础与边界,它由行政改革设定,是规划活动的新场域。虽是被入场,却迫使规划专业重新审视其核心对象——从“城市”到“国土”。“技能”延伸是过程与证明,它源于规划自身对有效性的追求,是在新时空中证明自己价值的关键技能。通过全过程服务,规划从静态的“空间设计”转向动态的“空间激活”。“才能”彰显是内核与升华,这是规划专业核心竞争

力的外在彰显。前两者拓展了规划的场域和时空，而服务对象的拓展则展示了规划的强大内核能力，标志着规划从一门关于“造物”的技术，升维为一种关于“治理”的新智慧，实现了真正的价值跃迁。这是一个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塑造”的升华过程，最终都统一于“新规划”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关键支撑的总体定位。

面向AI时代城市空间流态化挑战的柔性新规划

牛强（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教授），张浩（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博士生）

伴随着人类社会进入AI“奇点”时代，AGI、智能体、具身智能与生成式大模型等AI核心技术正在逐步重构人类生产生活的底层运作逻辑。AI并非对数字化的简单升级，而是通过对人类体力、脑力甚至创造性劳动的模拟、增强与替代，从速度、效率、范围等方面打破时空约束与人力依赖，从而带来了教育、医疗、消费、咨询、研发、金融等各类生活生产服务的可获得性与便利度大幅提升，导致对实体空间的依赖程度大幅度减少。例如自托管AI助理OpenClaw可通过智能体平台构建“一人公司”随时随地运作，特斯拉Cybercab无人驾驶出租车不仅替代了司机还大幅度降低了车费，Anthropic的法律类AI代理插件Legal能基本替代中等水平法律顾问等。正是由于无处不在的AI技术和移动互联网，城市服务供给与需求匹配才不再受地理集聚限制，逐步脱离固定空间载体，呈现出显著的流态化特征，而这也将成为AI时代城市空间演化的核心驱动力。

AI技术通过智能化调度、分布式配置与虚实融合的全链条赋能，推动城市要素流动从集中化、响应式转向分布式、预判式，众多城市空间突破传统物理边界与功能限制，形成“流态化”的城市空间新形态。①AI大模型与知识图谱构建的无时空损耗网络，让法律、咨询、教育、科研等知识领域的专业服务摆脱地理约束，形成“流动的服务空间”；②AGI、智能体与远程办公的融合普及，让办公行为突破行业壁垒、写字楼边界，在社区、家庭等多元场景完成，形成“流动的办公空间”；③AI算法精准匹配用户画像与消费需求，结合AI辅助选购、AI试穿、社区前置仓与智能配送等模式，让消费供给实时投放到用户身边，形成“流动的消费空间”；④无人驾驶与低空飞行器的普及，构建起空地一体化立体交通网络，形成“流动的交通空间”；⑤AI通过兴趣图谱精准匹配交流对象，打破地缘亲缘限制，催生跨区域虚拟社群，形成“流动的交流空间”。多元要素的流态化正在让城市空间从要素集聚的静态载体，转变为要素高效流动的动态流场。

以城市服务空间为代表的城市要素快速流态化，对以地理集聚为核心特征的传统位空间形成系统性挤压和挑战，其本质是价值创造的空间脱嵌与服务匹配的智能替代，传统位空间的集聚优势与匹配功能被根本性弱化，直接引发城市实体空间的功能需求收缩与资源闲置等问题。例如：远程办公与分布式办公的普及导致写字楼空置率上升、传统办公实体空间需求锐减等问题；AI赋能的全真模拟购物、无人超市让消费向线上与社

区末梢转移，核心商圈人流减少、实体商业萎缩；无人驾驶规模化运营提升了交通效率，停车位需求逐步减少；智能出行与低空交通持续分流地面客流，公交空座率提高，交通位空间的资源配置效率降低等。这一系列问题表明，传统以静态要素集聚、功能分区为核心的城市空间组织逻辑，已无法适配AI时代的空间流态化发展需求。

由此，面向AI时代城市空间流态化的趋势，城乡规划需要构建“形流场”深度融合、智能动态适应的柔性新规划模式，推动城市空间要素的动态、高效、精准配置，将城市空间从要素集聚的“静态载体”转变为要素流动的“动态流场”。具体而言：①推动功能复合的柔性空间规划策略，弱化传统刚性功能分区，构建高频动态规划模式，便利建筑用途转换，智能化改造存量闲置空间，适配流动空间的多元需求；②发展新型柔性位空间，包括满足人类情感交流与线下体验需求的柔性文化空间、依托流动创新网络的柔性第四产业新空间等，提升位空间价值，以体验和创新价值对抗流空间挤压；③打造柔性网络空间，弱化传统极核，通过大量虚实接驳空间，培育片区、社区、郊区等地的多元灵活复合节点，构建扁平化、泛中心、自适应的网络空间结构；④构建人—智协同的柔性空间治理体系，依托城市AI大脑实现要素流动的实时监测与动态调配，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全域均衡覆盖，完善要素流动网络，基于AI算法精准预测需求、优化资源配置，弥合数字鸿沟，兼顾技术效率与空间正义。

逻辑重塑与编制转型：存量时代公共服务设施规划的思考

丁亮（浙江工业大学设计与建筑学院副教授）

当前，我国城市发展已进入以存量提质为主的新阶段。公共服务设施作为保障民生福祉、彰显社会公平的核心载体，其规划编制也需主动适应存量时代的资源约束和需求升级，从编制内容、布局方法、规范标准等3个维度探索转型，构建契合存量更新的规划逻辑。

一是编制内容需锚定部门事权，从空间布局向治理赋能转型。以往公共服务设施规划以空间布局优化和规模配置为核心，重点解决了设施“从无到有”的供给缺口问题。但在存量时代，随着设施陆续建成，居民对公共服务的要求已从“有没有”转向了“好不好”，规划编制需同步回应设施运营、服务提质、机制完善等问题。2019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专项规划“由相关主管部门组织编制”，清晰界定了公共服务设施主管部门的规划主导权。在此要求下，规划要依据部门职责调整编制内容，回应现实治理需求。如：教育设施规划不仅要落实学校空间布局、核定建设规模，还要研究办学组织、教育资源分配等问题，破解教育公平难题；养老设施规划除了要完成空间布局外，还要明确运营主体、服务内容、保障机制及监管体系等问题。这种转型要求规划强化治理属性和可实施性，推动规划从技术方案向行动纲领转变。

二是布局方法需立足现实场景，从理论模型向精准落地转

型。以往设施布局往往基于“服务半径”画同心圆划分服务范围,再以服务范围覆盖率为依据编制布局方案。在增量时代,规划较少受现状约束,该方法有效解决了在大片未开发区域实现设施均衡布局的问题。但在存量时代,一方面,既有设施有其规定的服务范围,如公办小学依据社区、道路划定教育服务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按户籍所在街道提供服务,与规划理论中的服务半径覆盖范围存在较大偏差;另一方面,现实出行受路网结构、地形条件等多重因素影响,难以形成理想状态下的同心圆服务格局,传统方法难以精准表征真实服务范围。当前,随着大数据获取成本降低和空间计量模型普及,可依托多元数据开展需求精准评估,结合现实场景模拟设施实际服务范围,使布局方案更加贴合设施服务供给规定和居民出行特征。

三是规范标准需响应现实需求,从刚性管控向差异适配转型。以往设施规模配置主要依据“千人指标”,多采用全市统一标准或区分老城、新区设置。在增量时代,大量区域处于待开发状态、需求具有较强不确定性,“千人指标”通过构建标准化需求假设,有效保障了设施用地的提前预留和底线供给。但存量时代,这一标准化配置模式面临现实挑战:城市内部人口结构异质性显著增强,加之人口流动性提升、老龄化和少子化进程加速,不同区域的年龄结构、服务需求呈现明显分化。若沿用统一的“千人指标”配置设施,易导致部分区域设施供给和需求错配,出现供给不足和设施闲置的双重困境。因此,需基于区域实际情况开展差异化指标预测,建议将千人指标管控精度下沉至镇(街)层面,杜绝指标“一刀切”。可依托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网络(CSPON),动态监测人口结构和需求变化,为指标优化调整提供数据支撑,提升供需匹配效率。同时,对于需求总量不足的区域,可适度放宽服务半径标准,鼓励设施集中布局 and 资源整合,通过规模化运营提升服务效率和可持续性。

综上,存量时代公共服务设施规划编制转型,是对传统增量规划逻辑的重塑。唯有以部门事权为基础调整编制内容,以现实场景为依托改进布局方法,以实际需求为核心优化规范标准,才能使规划方案能用、管用、好用,精准契合存量时代城市高质量需求,为民生福祉持续提升筑牢规划保障。

大都市地区乡村功能转型的数智诊断、规律挖掘与规划调控

陈晨(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聘副院长、教授)

历经改革开放40多年的快速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我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和大城市周边普遍开始经历乡村地域功能转型,即从农业主导的“生产主义”乡村向休闲旅游、文化体验、生态保育等主导的“多功能主义乡村”演变。大都市作为区域的增长极、国家经济的重要支撑点以及参与世界经济竞争的节点,在腹地范围内的社会经济活动中居于中心地位,支配着周边区域要素集聚的流向与能级,进而决定整个区域的发展水平,大都市地区是中心城市周围具有紧密的经济、文化联系的毗邻地区,大都市的产业结构升级、区域内的城镇体系演变、空间治理结构重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都将引致乡村地域的

剧烈变化。可见,大都市地区乡村地域的城乡关系作用最强烈,该乡村地域的功能转型最具先锋性和多样性,是最有可能率先实现“全面乡村振兴”的关键区域。学界对上述大都市地区乡村地域功能转型规律认知不足,导致乡村地域功能转型面临行政区隔、政策限制、空间错配、土地约束等多方面的困境,亟待开展系统性的学术研究和规划干预。

一、新认识:乡村功能转型的复杂性与传统规划的局限性

从现实需求来看,大都市地区乡村地域功能转型至少面临如下三大挑战:一是人们往往认为大都市地区的乡村地域应具有极高的发展水平,但现实却并非如此,大都市地区的乡村地域甚至还存在“后发展”或外围塌陷的隐患;二是大都市地区乡村发展动能释放不足,乡村地域功能转型进程缓慢,大都市地区乡村地域尚未呈现应有的先锋性、多样性和复杂性;三是大都市地区乡村地域功能转型的复杂性和乡村治理手段单一化的矛盾凸显,政策制度和治理模式转变滞后于乡村地域功能转型,造成普遍的乡村产业承载空间的“非正规”利用现象,经济效益低和社会风险大等弊端日趋显著。

从未来趋势来看,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先发区域,大都市地区的乡村发展必将经历多维度的功能转型:产业层面从传统农业向“一二三产业融合”跃迁,空间层面因城乡要素流动加速而持续重构,社会层面则面临人口老龄化与文化空心化的双重挑战。这种转型的复杂性远超传统规划的应对能力。当前规划实践主要依赖静态统计与定性分析,难以捕捉乡村系统的动态演化规律,导致政策制定存在显著滞后性。核心痛点集中于三方面:其一,经济、社会、空间层面的管理功能和治理实践分散于发展改革、自然资源、农业农村等部门,缺乏系统性整合机制;其二,功能转型的驱动机制与区域分异规律难以通过传统方法量化解析,导致诊断结果粗放化;其三,规划干预对非线性、突变性转型响应不足,常出现政策与实际情况脱节的现象。这种困境呼唤研究方法的革新,而数智技术正为此提供全新路径。

二、新实践:数字平台介入下乡村发展的颠覆性创新

在自上而下的政策供给关注不足的情况下,我国大都市地区已经出现了大量数字平台介入下乡村发展的颠覆性创新现象,涵盖地方符号建构、生计模式创新及社区治理等多样化领域,展现出乡村社会在数智时代的适应性和创造力。代表性的新实践模式包括:一是地方品牌化与文化复兴。贵州台盘村的“村BA”实践将民族文化与体育赛事融合,增强了社区文化认同感与归属感,促进了农产品销售,甚至衍生出融合民族文化与篮球元素的线下商业形态。二是“三农”网红的数字传播与生计促进。乡村网红达人在社媒平台上发布的内容常聚焦炊柴做饭、采摘蜂蜜、野外捕鱼等“自然生存”场景,满足城市受众对乡村本真性与草根性的符号消费需求。他们积极打造并推广“原生态”品牌,强调农产品的天然属性与生产过程的专业性,将地方特产转化为承载乡愁与情感的文化符号。三是平台本地连接的用户化。数字平台通过在地方层面招募和培训社区团购团长等“地方平台补充者”,依托微信群等社交媒体工具,构建基

于社会经济关系的地方性网络,从而驱动本地社区的创新发展。四是数字平台作为知识经济空间的实践。数字平台可作为知识空间、共识空间与创新空间,促进知识创造者、产业、政府及农村民众间的动态互动,通过模拟地理与非地理邻近性弥补农村知识经济的结构性缺失,从而提升乡村韧性。

三、新方法:数智技术赋能乡村发展的新路径

乡村地区的既有研究成果多以典型村落的案例分析为主,虽然深刻但往往缺乏类型谱系或者空间格局层面的整体解释力,难以勾勒整个大都市地区乡村功能转型的时空演化趋势。这种局限性的根源在于,乡村长期以来被视为“数据荒漠”,传统的统计数据如统计年鉴或固定资产投资指标,由于更新周期长、空间精度低,无法有效捕捉乡村微观空间的动态活力。数智化乡村研究框架可以通过多技术融合构建“数据—诊断—规律—干预”的闭环系统,具体来说:在数据层,整合遥感影像、手机信令、POI、社交媒体、位置定位数据及政府台账等多源时空大数据,突破部门壁垒融合成新的乡村数字底座;在诊断层,运用机器学习算法对乡村功能类型进行智能识别和类别划分;在规律层,借助复杂网络分析揭示大都市地区乡村功能转型的传导路径与关键节点;在干预层,形成“诊断—模拟—决策”的动态优化机制。由此,通过实时监测人口热力、用地效率、产业强度等指标,动态感知大都市地区乡村的活力演变;利用大数据和小数据结合的方法量化政策、市场、技术等驱动因子的权重,解析乡村功能转型的内在机制;基于多智能体(ABM)仿真模拟不同政策情景下的转型轨迹,为决策提供预判支持。这种从“经验驱动”到“数据驱动”的范式转变,标志着大都市地区的乡村规划与政策研究提前进入精准化时代。

四、新探索:数智诊断—规律挖掘—规划调控的创新链

在数智诊断方面,大都市地区乡村地域功能演化是多层次、多维度、多阶段的乡村地域“功能转型”的结果,且应呈现一定的“空间格局”特征,包括乡村地域功能类型分异、乡村地域功能转型路径和乡村地域功能演化格局等三个方面。具体来说:乡村地域功能类型分异就是以生产、生活、生态功能等传统分类方法或者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分类方法,建立乡村地域功能指标体系,揭示若干时间截面的多尺度的乡村地域功能分异特征;乡村地域功能转型路径就是对多个时间截面之间的乡村地域功能转型历程——功能演化进行特征归纳,可能出现乡村地域功能的异化、复合化、强化或衰退等情境;乡村地域功能演化格局就是上述过程的空间格局演化特征,可能包括核心—边缘结构、行政区隔引致、重要廊道带动、随机空间分布等情况。

在规律挖掘方面,基于乡村地域功能转型的外缘系统和内核系统的二元结构,可以从“大都市区化的驱动机制”和“本地化的响应机制”两个方面构建大都市地区乡村地域功能转型机制的解释框架。一方面,大都市地区乡村地域功能转型中“大都市区化的驱动机制研究”按照如下展开:大都市区化推动跨区域的城乡要素资源配置一体化、大都市区化发展引致“地理—社会”空间治理的尺度重组、尺度跃迁和尺度重构和大都

市区的极化发展可能带来“圈层—廊道”式的乡村地域功能空间分异;另一方面,与外缘系统(大都市区化的驱动机制)相对应的则是本地化的响应机制——大都市地区乡村地域的人口、土地、产业、生态、文化等要素如何完成结构重组而孕育出新的功能。由此,大都市地区乡村地域功能转型的“本地化响应机制”可能是:以特色资源禀赋为链接点的本地发展,以地方政策创新推动本地要素结构重组,从而赢得发展机会,集聚经济驱动超地方市场、超地方产业职能和超地方社会网络。

在规划调控方面,基于大都市地区乡村地域功能转型的一般规律,开展“问题—目标”两种导向、“区域—本地”两个层面的规划调控。一方面,开展“问题—目标”两种导向的规划调控:①系统性地开展大都市地区乡村地域内的“后发展”地区、塌陷地区、功能转型受阻区等问题区域诊断,并基于上述规律开展“问题导向”的规划干预;②基于大都市地区乡村地域功能转型的规律性发现,开展基于“目标导向”的问题诊断和规划调控。另一方面,开展“区域—本地”两个层面的规划调控:①在区域层面,规划干预应推动大都市地区乡村地域的跨域要素配置、空间治理重组和圈层廊道分异,促进大都市地区乡村地域功能转型的整体效率提升;②在地方层面,不同资源禀赋差异、地方政策差异和治理文化差异对乡村地域功能转型影响显著,可开展差异化的分类规划干预。

(排名不分先后,限于篇幅略有删减)

修回:2026-01